

# 香港天主教會的新舊挑戰

田英傑著

李子忠譯



基督徒信仰告訴我們：天主在我們的社會中不斷行動。因此，我們有責任留意這些「時代的徵兆」，好能明瞭天主藉著這些事情所帶給我們的信息。在過去五十年中，香港天主教會曾經歷不少歷史性的重大事件，現在更要面對香港最重要的轉變：脫離殖民時代，回歸祖國懷抱。教會究竟怎樣面對這一切新與舊的挑戰呢？

## 「大陸難民潮」的挑戰

教會首先要應付的，是來自中國大陸難民潮的挑戰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香港剛經歷了四年的日治時期，教會不論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拮据艱難，面對戰後回流的居民，教會重新振作並展開行動正是刻不容緩的。除了原有的居民外，更由於中國大陸當時政局動盪不安，加上天災的打擊，

源源不絕的難民潮正湧入香港。一九六一年間，香港的人口由五十萬急升至三百一十三萬。教會隨即策動自己的設施和人員去為他們服務，初時甚至為他們提供生活的基本需要，繼而開辦社會福利中心、學校和教堂，來解決他們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需要。開始時，這些服務只是暫時和非固定性質，缺乏協調計劃，集中於這些中心和教堂，而且差不多完全由那兒的負責人各自策劃。但隨著經驗和支援的增加，這些服務變得愈來愈專門和專業化。這也要歸功那些決定留在香港服務的各修會專門人材的影響。

從一九六一年起，這一切社會服務，主要由香港明愛以香港天主教會正式機構的名義來統籌，這樣便發展成今日天主教會在教育、醫療和社會各方面的服務。這事實只需翻開《香港天主教手冊》，查看一下「香港教區教務統計」便可見其規模。

根據一九九六年《香港天主教手冊》頁552，教育機構：學校及學生人數：幼稚園39間（14,062人），小學154間（118,030人），英文中學及中文

中學77間（82,939人），職業先修學校及專業學校18間（9,296人），成人教育26間（62,406人），夜校5間（2,219人），特殊學校8間（652人）。學生總人數289,604人。社會福利機構計有社會服務中心14間，醫院6間（病床2,979張，診治132,284人），診所及醫院門診部14間（診治1,060,874人），幼兒園及幼兒中心17間（兒童2,583人），女孩護養院4間（300人），老人院11間（927人），老人中心13間（5,439人），康復中心14間（受照顧者1,001人），宿舍及賓館10間（78,094人）。

## 「梵二及本地教會」的挑戰

可是香港教會所面對的挑戰，不但來自社會的轉變，同時教會在自己的範圍內，也正遇到一股強大的新力量，鼓吹著一種內部生活和行動的革新。世界大戰後初期，香港天主教會在一九四六年四月間由一個傳教地區升格為一個「教區」，而她正要為這轉變而面對內部重組的挑戰。不久普世教會內，

人人都開始感到多股清新的氣象，這一切希望都匯聚在梵二所帶來的興致勃勃的氣氛中。實在說來，一九六零年代正是香港教會全面致力難民服務的時侯，這也剛好是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大公會議的時代。在本地也抑起了頗具敏感性的爭議。其時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白英奇主教（1899-1983年），當時已出任香港教區主教十多年，他出於深切的真誠和愛德精神，設法平衡保守派和激進派兩種傾向。他一方面設法鼓勵人們為新移民提供更充份的社會服務，同時，對於那些反對某些方法，認為會導致所謂「麵粉教友」的人，他習以為常的回答：「這一代或許會是這樣，但他們的子女會獲得較好的信仰培育！」另一方面，他也熱衷參加梵二會議和敏於回應梵二所提出的新要求。因此，他策動眾人去實踐禮儀改革、在禮儀上採用中文和中文聖經（思高聖經學會的方濟會士在一九六九年完成了全部中譯本）、革新教理講授（教理中心於一九六三年成立）、以及重組本地教會。出於一股真誠的心，他

很快便深信教會「本地化」的必要，為此他初時要求有一位國籍司鐸充任他的輔理主教，繼而提出請辭，好能在一九六九年把教區交由首位本籍主教徐誠斌（1922-1973年）接管。

這時候，梵二提出的教會改革帶來的挑戰愈來愈廣為人知。徐主教很快便意識到，梵二的新趨勢必需盡量被廣大的天主教徒所吸收。因此他決定召開一次教區會議，目的是按照梵二的精神徹底革新教區，策劃未來。會議由一九七零年持續至一九七一年，有超過四百名神職人員和平信徒參加；他們共分十一組，在有關福傳、禮儀聖事、宗教培育、學校教育、平信徒、神職班、修會機構及人員、社會使徒工作、大眾傳播媒介、合一運動、和教區行政等事宜，作出反省及交換意見。

徐主教正全力投入去加強教會在解決香港社會問題上的角色，同時亦增進與附近地方教會的聯繫，可惜他的整個努力被他在 一九七三年五月的突然逝世而中斷。李宏基主教（1922-1974）的短促任期，

也未能把教區定下的計劃迅速付諸實行。

## 迎著「九七」而來的挑戰

在一九七五年四月胡振中主教（其後被擢升為樞機）出掌教區之始，教區才能更有系統地繼續面對來自教會生活和社會轉變的挑戰。胡樞機首先關注到信友生活的革新和教區重組的問題：他首先把教區劃分為三個區域，並在各區委派一位主教代表，他又成立新的堂區以回應發展迅速的新衛星市鎮的靈性需要。隨後他又重組位於新成立的教區中心（一九七八年）的中央辦公室，鼓勵出版牧民手冊（一九八二年），任命一位主教代表負責教育事務（一九八五年）等；他在這整個重組過程中，特別關注到更善用本地人材，以達成更廣泛的教會「本地化」。

但香港在一九八零年代在社會及政治上所經歷的劇變，都使胡樞機和整個天主教會極度關注：中國大陸由於經濟改革和自由化的政策，開始對外開

放（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開始），而有關香港未來前途的問題亦放到中英談判桌上討論（一九八四年達成中英聯合聲明）。

由於香港的「橋樑」角色，這些事件使本地教會面臨一個新挑戰：本地教會在與中國及中國教會日漸增加的接觸中，究竟應負起一個怎樣的角色？面對全港市民愈來愈表露出的憂慮和無信心現象，應該怎樣適當地準備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祖國？

香港教會已設法面對新的處境，並以勇氣和高瞻遠矚的心，去為未來作出迫切的準備：教會成員的生活都集中在基督徒使命和承諾上，而一些教區機構也進行了調整，希望這些行動能有利於香港教會的「修和使命」及她對中國教會的「橋樑」作用。

胡樞機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，發表了他論香港教區未來牧民承擔的「邁向光輝的十年」牧函，這份文件包含了上述一切的新路向。文件的重點強調信仰日趨成熟的必要，指出要透過實踐基督徒使命和共融的經驗，尤其是透過「信仰小團體」的經

驗去達成。建立這些小團體的努力，應與改善教區在其他方面的服務並駕齊驅，這些包括大眾傳播媒介、教育、社會福利、神職班和修會會士的延續培育，以及與中國的關係。

可是草根階層的香港市民，對未來愈來愈失去信心，並作出不同的解決辦法。而一般的香港市民和天主教徒的主要選擇不外如下：

——積極地與未來的政府和政權建立起一個合作的「可行關係」；

——或消極地默默接受政治轉向（這是一個憂喜參半、存有戒心的宿命論）；

——或設法建立起一個穩固的法理基礎和充實的個人培育，好能真正實現「一國兩制」和「港人治港」的理念；

——最後，或是最常見的解決辦法，即移民海外。

香港天主教會當局看來是倡議著第三種選擇：爲了克服大部分人的缺乏信心，並爲了更積極地爲未來作好準備，教會建議並鼓勵天主教團體，更多

參與和香港的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公共事務。教會發表了數份文件，並在教區和堂區層面上發起了不同的行動，目的就是要提起天主教平信徒置身問題的意識，並勸諭他們要直接參與公眾事務。

依循這路線，胡樞機展開了一連串的行動；他首先發表了天主教會對香港前途的聲明（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）；其目的是要在中英行將簽署聯合聲明（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）之前，澄清天主教會的立場和期望。隨後他又敦請天主教團體細心研讀「中英聯合聲明」，並積極參與由一九八五年至今進行的不同選舉。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教區主教公署發表的指引這樣說：「爲了使信友獲得適當的培育，堂區和教會組織應盡量安排一些講座和研習會，研究天主教會的社會訓導、香港的政制和社會分析。」此外，教區還發出了其他的指引，涉及參加特區首長推選委員會，和一九九六年下半年的臨時立法會的事宜。

同時，「邁向光輝的十年」牧函內有關教會生



活其他方面的提議，也逐一實現了。教區的架構按照過渡時期的新需要而作出了適應：經過漫長而徹底的諮詢後，教區重組架構的構思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公佈，並逐步予以實現，這也包括最近兩位助理和輔理主教的委任在內（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舉行祝聖禮）。

最近數年的牧民工作，還要面對大量菲律賓賓外勞（主要為家務助理）的湧入，和數次越南難民潮所帶來的大挑戰。教會當局曾盡力為菲籍人士提供充分的靈修輔助和牧民服務，至於為越南人士也作出了合宜和固定的安排。

於一九九四至九五年間，對於在一九八九年「邁向光輝的十年」牧函中所作的承諾，亦作出了一次中期性的全面檢討。檢討的結果顯示，教區在這五年當中，透過特殊的委員會和開辦三個培育中心，集中力量於平信徒的培育，和革新他們的信友生活上。堂區和善會在平信徒培育上都全力以赴：它們訓練了相當多的領袖，並為數個「信仰小團體」奠

定了穩固的基礎。

司鐸與修女的培育受到了關注，學校與教育工作也有改善，學生評估制度有了積極的改革，在採用母語教學一事上也有進展，公民和倫理教育亦有成果。在社會傳播方面也有進步，並且推出了不少優良的視聽教材和作品。

教區透過委任一位主教代表專責社會服務，成立了醫院和傷殘人士牧民委員會、菲籍人士和越南籍人士牧民委員會、勞工事務委員會及勞工牧民中心等，使教會在社會中的「僕人角色」大大加強。香港明愛的屬下機構，也依照教區的指引作出了相應的適應措施。教會對社會的正義和平所肩負的「先知角色」，在教區和堂區的層面上也有所改善。

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慶祝香港天主教會一百五十週年之際，香港教會也重視與中國和與中國教會的關係，尤其突顯出其「橋樑角色」和「並肩同步」的需要。此外，不同組別和個別人士，其中包括胡樞機在內（分別在一九八五年、一九八六年

和一九九四年十一月）回國探訪，與國內的天主教友保持著接觸，並在多方面支持他們。

在繼後的五年當中，牧函集合了檢討報告和建議，並以「傳揚福音，拓展天國」為大方向，再一次強調過往引導著香港教會生活的兩個基本取向，即延續教區在不同服務方面奉行著的教會使命，以及實踐對中國教會的「橋樑角色和修和使命」，這也是教宗委託給香港教會的任務，亦是香港本身的地理因素所構成的使命。

## 「一九九七年後」的挑戰

香港回歸中國將對香港天主教會帶來新的挑戰，一個證明自己是真正成熟的本地教會的挑戰。這成熟是在多方面的：

——能夠在一個較俗化和唯物主義社會環境中，繼續她為基督作證的先知任務；

——能夠在一個平等基礎和互不干涉的原則下，在中華民族中與中國教會通力合作，促成福傳與修和

的工作；

——能夠與其他附近的地方教會，以姊妹教會的身份保持適當的關係，亦能和作為普世教會共融合之一之標記與保障的教宗，保持正確的關係；

——面對政府當局，能保持合理的自主和正確的合作。

## 結論

究竟天主教藉這些新舊挑戰，要向香港天主教會傳遞些什麼信息呢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必需經過長遠和深入的反省。毫無疑問，這些挑戰可同時被視為一項考驗或一項恩寵：基督不斷考驗祂的教會，要看看這個地方團體有多成熟，查驗她在延續自己使命上的勇毅、及對祂和祂在香港及中國的弟兄姊妹的忠信。但在這些考驗當中，基督並不離棄自己的教會，不會任憑她獨力奮鬥：從應付過往挑戰的經驗所得，基督的不斷臨在，將成為香港教會通過未來考驗的唯一穩確保證。 □